

新书刊载：《大同高见植树，高见邦雄》

“大同”的“高见”

天下“大同”，是中国古代儒家在《礼记·礼运》中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；大同思想，也就是中国式的“乌托邦”思想。

“高见”，在汉语中表示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谋略。

本文要说的大同，是山西省的第二大城市，素有“煤都”之称的大同市。其名自辽代《礼运·大同》篇称为大同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本文要说的高见，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日本朋友的姓氏，其名邦雄。

1940年1月15日，中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在黄土高原上，在离大同不远的延安，借给中共元老吴玉章先生祝寿的机会，他说出了一段至今仍然影响着很多中国人的“语录”，那就是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贯的有益于青年，一贯的有益于革命，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！”

有朋友介绍说，高见邦雄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是毛主席的忠实崇拜者，他曾经在中日邦交前辗转香港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真理，特地到当时中国农业的旗帜——大寨去参观考察。那时，年轻的他能够把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日文版全文背诵出来。

有次见面我问及此事，他笑笑未知可否。

是的，他有比这更重要的话题。

从1992年开始，高见邦雄从日本来到位于中国黄土高原东北边缘的大同地区，从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植树造林活动，至今已经18年了。

18年里，高见邦雄“一贯的”坚持不懈。

每年，他都会从日本到中国，从中国到日本往返很多趟。

每年，他总有一二百天在中国，在大同地区的县里，乡里，沟里，山里，在黄土高原的皱皱折里。

想当初，尽管他是全国青年联合会推荐前往的，但是，在当地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疑他的动机。曾经一度，他还是被监督的对象。

大同人，乃至整个山西人，都曾难以忘记不久前的日本侵略战争。作为华北主要战场之一，那里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磨难。大同煤矿至今还有“万人坑”作为牢记历史、展望未来的去处。这里的人“觉悟”一向很高。

他是一个日本人，凭什么要来中国植树做好事？

还有过放狗咬他的。不过，高见说他控制狗有绝招。

尽管如此，他像当地林业局干部的影子。只要他们下乡，他们走到哪里，高见邦雄就跟到哪里。

日子久了，人们怀疑他别有用心的心放下之后，又开始怀疑他在大同的“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”？

至少，18年已经过去了。

如今，到处都有他熟悉的老乡，只要他出现了，就会有人热情地招呼他。

有人请他吃饭，有人邀他喝酒。

老乡们有叫他“高见”的。

还有干脆叫他“老高”。

和很多热衷中日交流的日本朋友不同，高见至今也不会讲中文。很多时候没有翻译陪同，不过从来不影响他跟当地人的交流与合作。他和雁北的农民兄弟从素不相识到相互理解，进而可以密切合作。

他说，人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语言。高见只需要看对方的表情和嘴形，就能看懂甚至连翻译也听不懂的大同方言。

高见邦雄1948年出生于日本鸟取县。1966年进入东京大学，因为参与当时属于比较激进的“革命”，1970年肄业。此后不久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，他开始与红色中国关系密切，经常往来中国寻找“革命”的机会。

1992年，他和几位一起寻找“革命”机会的同志来到中国，转了一圈，再次游览他熟悉的黄土高原，遂提出了在大同植树造林的“革命理想”，结果，面对荒芜的黄土高坡，同志们从质疑到坚决反对，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。

倔强的高见邦雄的“革命阵营”内部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分道扬镳。

高见邦雄“固执己见”，坚持在黄土高原“闹革命”。

这一闹，就是18年。

18年里，为革命吃了多少苦，受了罪，只要他自己知道。

1992年他参加创建了非政府组织NGO“绿色地球网络”，1994年担任事务局长至今。为了贯彻落实“三公开一监督”，向关心他们的人通报行踪、活动、财务，以获得大家的了解、理解、支持，从1999年开始，高见利用网络发送电子通讯报告。4年多，发了200多期，介绍他在中国黄土高原植树造林所见所闻等一切在大同发生的“鸡零狗碎”的全部经历。

很多人看了被感动，不少日本人自愿报名随他参加每年春夏组织的“黄土高原植树之旅”活动，把到中国黄土高原旅游和为保护环境“学雷锋做好事”有机结合起来，几年下来，人气越来越旺。

有不少过来黄土高原的人主动要求加入这个公益性的组织，截至2005年2月，绿色地球网络已经有了626位个人会员；26家团体会员。他们积极参与活动，主动缴纳会费，甚至慷慨捐款，用于支持中国的环境植树事业。

他们都是日本人。

2005年夏天，受高见邦雄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精神所感动，中国学者李建华、王黎杰翻译了他的日文版的《黄土高原来信》，并且推荐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以《雁栖塞北——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》为书名出版了中文版。书中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见邦雄在黄土高原13年里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。

我有机会获得了一本，324页书没看完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被他的事迹感动得不行，抄起电话打给李建华，要求先购买200本，以作为我主持的中日关系读书会里推荐图书。同时，也作为感动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工具。结果，晚上赶到北京芳庄园他存书的地方，只拿到了150本。

这几年里，我有针对性地以此书为礼物，的确感动了不少具有革命良知的同胞。大家都是中国人，看到一个日本人，不远千里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，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里吃苦受罪，不为名，倒贴钱，种树为了绿化，为了给那里的乡亲们示范；有树结了果，卖钱收入为学校助教……大家多数跟我反馈的读后感，说得最多的是“高见邦雄真雷锋啊！”

他是我认识的来中国学雷锋日本雷锋之一。

也是我认识的很少见的很“雷锋”的雷锋。

在大同，高见在缺水荒凉的山地上，从事了一系列带研究性质的造林活动和造林模式，如今大都已经都具有了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了。

他种植“地球环境林”（山地和丘陵的防护林）。几年下来，以三种松树（油松、樟子松、华北落叶松）为主和灌木（沙棘、柠条等）混合种植获得了成功。

在大同县，他租用国营小块圃地建起了一个“针叶树育苗基地”，一个7公顷的“白登苗圃”，以期利用菌根菌技术培育松树苗。结果，苗木生长良好，栽植后成活率高。

他的“喜鹊林”实验林场也在大同县，面积有600公顷。除了以松树为主的造林外，还试验栽植大同南部地区生长的落叶阔叶树。

在灵丘县的86公顷自然植物园里，通过禁止放牧和砍伐，观察自然植被恢复情况；用在自然林采撷的落叶阔叶树种子育苗、进行恢复植被对水流增减影响的调查。结果，可以科学地确认落叶阔叶树多很有利于水土保持；禁牧禁伐之后，自然植被的恢复力很强。

他与当地学校合作，建设了“希望果园”，种植了仁用杏树、葡萄、苹果、花椒、梨、李、胡桃等。收入的70%到80%分配给管理果园的农家，其余的赠给小学帮助发展教育。一开始，兔子们经常啃咬树苗根部的皮，经常导致树苗因此死亡。然后，补植；再啃，再补植；直到兔子啃不动树皮为止。

高见说，我们要从失败中站起来。不要怕失败，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。

在日本大使馆的支持下，他在大同市南郊区兴建的20公顷“环境林中心”，有苗圃、品种园、实验和培训设施，以及根据土壤净化原理所做污水处理的设施，能够把排放的污水变成可以利用的水源，由此成了合作项目的活动基地。

重要还有，他通过改善育苗和栽树技术的实践活动，为当地培养了技术人才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老乡们对植树造林的信心！

在日本，高见邦雄获得了大阪府民会议的“大阪环境大奖”；朝日新闻举办的“走向明天环境奖”；每日新闻举办的“每日国际交流奖”。

在日本，高见邦雄获得了大阪府民会议的“大阪环境大奖”；朝日新闻举办的“走向明天环境奖”；每日新闻举办的“每日国际交流奖”。

在日本，高见邦雄让很多在北京生活了若干年的“北京人”重新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一次自己的北京。

接着，他沙哑着他饱经风霜的嗓音说——

桑干河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的管涔山脉，由西向东横贯于大同市中部，进入河北省后，流入官厅水库。从官厅水库出来之后，下游改称永定河。永定河流经北京西郊，河上还有著名的卢沟桥。然后，再向东流入天津附近，与海河交汇后最终流入渤海。

官厅水库？这可是北京人都知道的。

官厅水库与密云水库并列为北京市仅有的两个主要水源之一。

但是，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自1998年以来，官厅水库水量减少，水质恶化，如今已经无法作为饮用水使用了啊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官厅水库的修建原本是为了让永定河不再泛滥。后来，又想成为北京市的饮用水源。而直到今天，官厅水库仍然迟迟无法实现其“理想目标”，设计的40多亿立方的库容，如今只装着不到一亿方的水……

除了污染，最致命的问题是：上游全长388公里居然修建了270多座水库，这岂不导致来水量远远低于预期量？这样让永定河能不干枯成一条死河？

显然，为了保护水源涵养和防止风沙，在以桑干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同雁北地区，最重要的是进行绿化建设。

“我希望，明年春天，在座的各位能够抽时间去大同看一看，了解一下那里的环境情况。大同到北京只需要三个小时。”

——高见邦雄沙哑着嗓子在邀请大家呢！——周冬霖著《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——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》

人民网日本版 2010年5月21日

（责任编辑：陈建军）